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张 勇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关键词: 援越抗美 外交战略 中美缓和 启示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苏联介入越战后,中国对越援助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处理外交事务日趋务实。援越抗美战争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与越南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友谊。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诸多启示。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2)04-0031-04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中国与美、苏、越三国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变迁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美国企图控制越南而发动的侵越战争,中国率先做出激烈反应,迅速出台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60年代中期,苏联强势介入越战,使本已趋于破裂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使中国将苏联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将战略防御重点由南向北转移,做出了与美缓和的战略决策。进入到70年代后,中国虽然一如既往地高调宣传反美斗争,但却加快了与美和解的步伐,最终完成了由“联苏抗美”到“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变。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为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开始刻意淡化对外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务实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在越南问题上,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与苏、越两国紧密配合,巧妙地利用美、法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孤立了好战势力,促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即使对于新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中国领导人一改往日的敌对与仇视态度,表现出和解的姿态。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声称:“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要做到。”^{[1]246}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未改变华盛顿当局对红色政权由来已久的敌视态度,并视越南为控制亚洲遏制中国的战略要地,趁法国离开后留下的空隙将本国势力日益卷入越南。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虽然逐渐转变战争思维,力图集中精力发

展国民经济,但美国挑衅性的举动让中国领导人很自然地想起几年前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再次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他们绝不愿意帝国主义将战争又一次打到自己的家门口。同时对于长期奉行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必须大力弘扬。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2]274}因此,援助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就成为了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中美两国在越南的冲突在所难免。

1961年美国发动对越南的“特种战争”后,中国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决定一次性向越南无偿提供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武器^{[3]159},并号召“把美国侵略者从东南亚赶出去”。^[4]在高调宣传反美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却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美国最主要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苏联而不是中国,即使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仍然认为美国并非蓄谋已久,而是由于错误的信息判断所造成的。他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513}可以说,面对美国在越南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毛泽东还是抱着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一方面为安抚北越领导人,中国政府向北越保证公开将两个高炮师进驻南宁和昆

收稿日期: 2012-07-12

作者简介: 张勇(1976-),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援助观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项目编号: CX2010B187)

明,并集结30-50万兵力于中越边境随时准备投入与美国人的战斗;另一方面向美国传递中国援助越南的决心,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声称“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5]357-358}同时,周恩来向美国暗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6]439,440,442}由此可见,中国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是积极但又谨慎的。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好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驱动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加上对新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担忧,中国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十分反感,对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在舆论上大肆声援,而且采取了实际上的援越行动。但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权衡与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严重后果,在援越问题上是高调宣传、谨慎行动,小心试探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对美国出格的举动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容忍与克制。

二

越战初期,由于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与美缓和的外交方针,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态度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了舆论上的有限支持外,并无实质上的物质与军事援助行动,实际是采取了消极回避、试图脱身的策略。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者在国际形势看法上的分歧,而这一分歧进一步恶化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刺激了中国援助越南的决心。

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援越的态度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强调越南的抗美斗争应该更多地依靠本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能过于依赖别国的军事援助。1965年4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主张“我们现在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7]724}发生这一转变的最直接因素源于苏联在越战中的介入。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改前任领导人在越战上的冷淡态度,变得活跃而又积极。1964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愿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8]9}1965年2月和4月,苏越两国高层互访,苏联承诺对越南提供必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的高调介入,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与不安,从此中国援越抗美的主旨在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外,增添了与苏争越又一新的内容。为显示与苏联之间的距离,中国政府宁愿实施与苏不同的战略,强硬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同中国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并指责苏联此举是意图“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9]394-395}此后由于中国领导人多次提醒劝告北越高层抗美斗争应主要依靠本国人民,在援助的形式上也开始更多地转向精神支持,这引起了越南方面的不满,中越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越南亲苏疏中的立场也日益鲜明。

随着中苏矛盾的不断扩大,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日益担忧。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上明确要求要提高战争警惕,提防“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核战争”,中国“准备两面打”。^{[10]520-525}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更是让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并断定苏联

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1]

很显然,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助越南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是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到国家关系决裂的促动因素之一,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着中国对抗美援越方针的调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来自苏联的威胁比美国更为现实而直接,对苏联的敌意也愈益加深,不愿在援越问题采取与苏一致的步调,刻意显示两国之间的距离。对于苏联在北越“过分热情”的表现,中国充满戒心,不断提醒北越领导人:苏联的援助并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控制越南、二是孤立中国、三是缓和苏美关系。因此,当苏联支持越美和谈时,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并将之与同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告诫越南不要落入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联合设置的圈套中。为说服越南领导人,周恩来还结合本国与美斗争的历史经验说“根据中国的经验,不把美国打到认输,就不会有和平谈判”。^{[12]225}在文革时期“革命外交”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已将自己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任何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妥协的行为都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夹在中苏之间的越南在苏联不断增加的各项援助下,感情的天平已经开始向苏方倾斜,对中国的意见越来越感到不快。北越的报刊杂志开始发表中国历史上对越南“侵略”的文章,以此影射当时中国对越南内政的干涉,不断制造反华舆论。中越关系日趋紧张、貌合神离,之所以表面上还能维持,主要是因为越南的反美斗争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3]229}在苏越联盟难以逆转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重新调整外交政策,集中精力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为中美走向缓和之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三

1969年发生的三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援越抗美方针的进一步调整。一是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对苏联可能入侵中国的认识,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心目中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二是胡志明的去世使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完全被亲苏势力所控制。三是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希望能在美越和谈上得到中国支持,从而尽早从越战中脱身。面对彻底破裂的中苏关系和渐行渐远的中越关系,对于美国抛来的橄榄枝很自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兴趣。在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14]72}的结论后,中国联美抗苏的战略构想日渐清晰。外交战略思想的转变,使中国在美越和谈上一贯坚持的强硬反对态度也有所松动。1969年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时表示:美越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7]10320}对于这一表态,周恩来还特地进行了解释:因为美越谈判有苏联插手,苏联把越南当作与美国交易的筹码。^{[15]539}与此同时,1969年2月起中国援越部队陆续撤回国内,对越军事援助也大幅削减。^{[16]101}至于1969年签订的中越援助协议,中国方面在半年时间里仅完成了31.4%。^[17]

中美和解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1970年4月美国对柬埔寨公开的武装入侵,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南方的威胁并未解除,不把美帝国主义彻底驱逐出东南亚,中国南部边陲将永无宁日。而要想让美军完全撤出,只靠谈判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必须以打促谈。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8]为进

一步表明中国的立场,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 584}这一出乎美国意料的强硬反应,确实对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尼克松显然不想因为这一事件而影响到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6月30日,美国宣布从柬埔寨撤军,中美两国再次寻求缓和彼此关系的突破口。双方无疑都意识到,如果印度支那的紧张局势得不到有效的缓和,将会大大延迟中美和解的步伐,进而损害各自的国家利益。

此后,中国对美越和谈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与范文同会谈时说: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的不错。^[19]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美越和谈的期待。美国方面敏锐察觉到了中国对巴黎和谈态度的转变,对华表现出友善的姿态。10月下旬,尼克松在公开场合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次年中美共同导演的“乒乓外交”历史大剧的上演和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消除北越的疑虑,在1971年3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20] 441}事实上中美和解的时期却是中国援越力度最大的时期。1971-1973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协定金额超过90亿元人民币。^[21]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鲜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在进行外交决策时的复杂心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对越南的援助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有力回击,因此援越抗美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但另一方面,在美苏两强的压力之下,尤其是面对来自日益增大的苏联的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以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是难以同时应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所以,“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22]当联美抗苏的战略思路成为领导层共识后,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既要高举国际主义的革命旗帜,又要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既要援越抗美斗争坚持到底,又不能因此阻碍中美和解的进程。历史最终没有成全中国两全其美的外交构想,虽然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真心诚意,但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越关系也走到了尽头。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越战结束,中国完全腾出手来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从此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

四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援越抗美时期外交政策的不断变迁,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基本利益,即安全利益,而在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总是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基础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会将这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融入到国家利益里,甚至用来解释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高举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国际主义旗帜,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美军撤出越南为止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意识形态并非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要素,一旦国家核心利益需要,它很可能就会被用来充当实现这一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作用是纯粹的军事、政治斗争所无法替代的。当意识形态被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来使用时,主要意图一方面是

凝聚本国社会成员的向心力,保持同步性,给自己的政策罩上一个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是为了迷惑他人,掩盖自己的真正政策意图。^[23]在援越抗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形态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毛泽东一直存在与美缓和的心理,但始终未放弃“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即使在两国关系走向缓和的关键时期也不例外。之后,中美关系的缓和,既是中苏关系恶化、中越关系疏远的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恶化和疏远的程度。看似牢不可破的兄弟加同志式的亲密友谊,在国家利益取舍的关键时刻,失去了往日的温情,中国与苏联、越南的关系也相继土崩瓦解。50年代初期,基于意识形态一致基础上的中苏越三国结成的同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利益分歧被暂时的人为掩盖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因素必然大打折扣。由于政治力量的严重不对等,各自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意识形态趋同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好感一步步让位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这足以说明纯粹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之脆弱。当中国公开挑战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与之抢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地位的时候,苏联大国、大党主义的行径酿成了中苏之间不断的纷争,苏联人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论战中表现出的那种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致使争论的范围已不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其“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24] 294-29}这场没有胜者的争斗,将中苏之间的矛盾公诸于世,导致了两国之间的裂痕无以弥补;而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本国反帝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则加深了越南对中国古已有之的警惕心,对中国的离异情绪日渐明显,中美的接近更让这种离异情绪演化为强烈的仇视心理,越南甚至将中国视为“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26] 67}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使得两国一度徘徊在战争的边缘;而中越关系的恶化,更是直接导致了越南以怨报德,对中国兵戎相见,挑起了对中国的战争。

援越抗美时期,中苏、中越、中美关系的曲折变化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相互之间总会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感;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相互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信念,则容易产生疏离感。但由于各国具体国情的区别,如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国际地位等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需求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即使同一意识形态内部也会产生分歧;同样,即使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之间,由于一定时期内有着相同的国家利益诉求,也完全有可能暂时摒弃前嫌,成为战略上的盟友。由此可见,如果单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解读中国援越抗美的动机与目的,难免会消解我们对列宁主义革命理想的认知与理解;如果一味从意识形态出发来诠释中国援越抗美的整个历程,则更难以拨开历史的迷雾,无法揭示历史的真相。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反思历史的教训,真切地认识到:在考虑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5] 330}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现在世界已进入冷战后时代,但是,国际社会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当前

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话题,如霸权与平等、自由与民主、文化冲突与文化安全等,无一不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体现出来。中国作为一个日益成长的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大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妖魔化”等论调也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争论总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中国的生存、发展等国家核心利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奉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今

国际社会并非呈现出一派万世泰平的和谐景象,国家利益之间的激烈争夺、民族国家间的巨大差异、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都使得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而敏感的角色,充当着国际事务往来中的当然政治话语。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当充分地利用意识形态的手段,但又要避免因意识形态分歧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对抗,以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大化,互利双赢或互利共赢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外交结果。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4]把美国侵略者从东南亚赶出去[N].人民日报,1962-05-19(1).
- [5]郭明等.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C]//北京:时事出版社,1986.
- [6]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8]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1]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N].人民日报,1968-08-23(1).
- [12]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 [13]张如礞.与河内分道扬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 [14]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G]//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 [16]李丹慧.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M].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
- [17]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03):124.
- [18]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J].美国研究,2000(01):100.
- [19]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J].党的文献,2002(03):70.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1]薛谋洪、裴坚章.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22]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J].党的文献,1995(06):77.
- [23]任晓等.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2):6.
-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5]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董翔薇)

Adjustmen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Reve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iding Vietnam Resist America War

ZHANG 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Key words: the War of Aiding Vietnam Resist America; diplomatic strateg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ase relations; revelation

Abstract: The Vietnam War broke out in the early 1960s. Take both of the national benefits and the ideology into consideration, China decided to aid Vietnam and resist America. After Soviet intervened with the Vietnam War, the attitude to aiding Vietnam of China changed a little subtle. In upholding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China deals with foreign affairs increasingly pragmatic. Later in the war,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ideology factors gradually played dow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scale used for the concerns in the diplomatic decisions was leaning towards the National Benefits, finally resulting in the paramountcy of the national benefits. Adjustmen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during the Period of Aiding Vietnam Resist America War, for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inspiration in today's China diplomacy.